

TO EVERYBODY FOR EVERYBODY

*Little
Masterpiece*

大家小书·洋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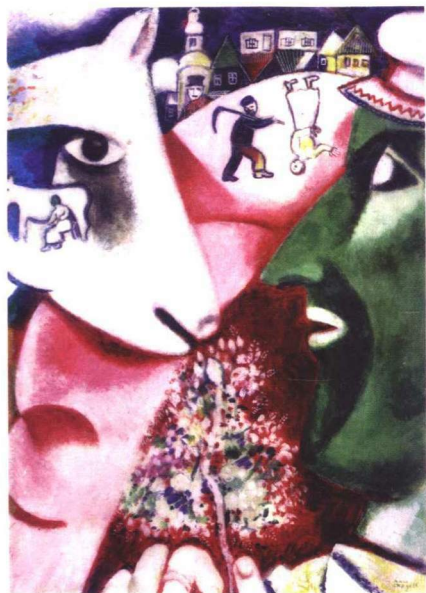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们设身处地地
去为另一个生命着想。

动物的生命

〔南非〕库切 著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TO EVERYBODY FOR EVERYBODY

*A little
Masterpiece*

大家小书·洋经典

~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

动物的生命

〔南非〕库切 著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5-5527号

Copyright©1999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物的生命 / [南非] 库切著；朱子仪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大家小书·洋经典)

ISBN 7-5302-0831-4

I. 动… II. ①库…②朱… III. 散文—作品集—南非—现代 IV. I47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8766 号

大家小书·洋经典

动物的生命

DONGWU DE SHENGMING

[南非] 库切 著 朱子仪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5.25印张 91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2-0831-4

I·796 定价：10.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大家·小书·洋经典

钱满素

手捧一本精致的小书，心怀一份闲适的情趣，忘却周围的喧闹、心中的烦扰，专注入神，与世上最优秀的灵魂对话，这是对智力的激励，更是人间一大享受。两年前，《大家小书》系列开始问世，选的就是这类精致小书。三辑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读者见了很是喜欢，真是应了“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这个初衷。如今推出这套“洋经典”，读者一定也猜到了，就是要把目光越过国界，投向世界。

这里的“大家”是个双关语，小书出自大师之手，又传入大众之手，这大家不是那大家。可是再一想呢，既然汉语中一个“大家”可以同时表达两层不同的意思，又可见这两家原本是一家。如果名家名著不是道出了常情常理，得到了常人的理解赏识，又怎么能经得起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诵读呢？大家与大家本无距离，大家与大家你我相依。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书不在厚，在于弥漫渗透其中的灵气和悟性。大凡经典，必有它独到之处，思前人之未曾思，写旁人之未曾写，也不论其独创的是思想，是形象，是语言，还是境界。书海茫

茫，信息泛滥，我们常苦于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若问求知的捷径，难道还有比经典更好的吗？经典是众人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真可谓书中之王者。但经典又并非高不可攀。常言道，朴素乃真理之本，美之本，也是经典之本，尤其像本丛书所选的小经典，都是直抒胸臆，娓娓道来，无须旁征博引。只要用心，经典是好读好懂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历史就是不同文明交融的过程。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地球村，国界和地理距离已经不再如昔日构成障碍，文明间的相互接触也更为频繁。交流多了，共识增加，冲突也是难免。人类如何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达到多元共处的理想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相互了解了，了解有助于消除猜疑、消除隔阂。

“洋经典”系列为读者推荐了一批小巧玲珑的外国文化好书，丛书所选作品来自各国大家，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精华，不少是作家的代表之作，而且可诵易读。它们题材各异，体裁不限，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社会、伦理无所不包，随笔、散文、游记、自传、小说、论著应有尽有。一册小书，凝聚人类智慧，在轻轻松松的阅读中，我们和世界沟通心扉。

要理？还是要命？

赵白生

库切是苦行僧。他说：“我不喜欢写作，所以我得逼自己。我要是写的话，情况会挺糟糕，可我要是不写，情况就会更糟糕。”夫子自道，用在《动物的生命》上也贴切。

写《动物的生命》，当然糟糕。你不是动物，怎么去写动物的生命？更糟糕的是，一写动物，就要得罪恶贯满盈的同胞——人类。这样吃苦不讨好的事，库切是不会放过的。不过，你不必为库切担心，他是多年苦行熬成圣。虽然不像齐天大圣有七十二变，但他还是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澳洲的名小说家，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太太。

堂堂的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库切作演讲，他却真人不露相，玩起了布袋戏。他不写论文演讲，却在讲台上念起了自己的小说，而让小说中的人物，同样也是名小说家的科斯特洛，去替自己到一所美国大学演讲。这样做，他的布袋里卖的是什么药？

库切的布袋里暗藏着两种药。

第一种药是小说家的特效药。库切是小说家，不会不知道小说惯技的诸多弊端和小说家言的荒诞不

经，可是他深知，再现“真实的氛围”，小说确实技高一筹，无可替代。在一所名牌大学，作一次学术讲座，谈谈动物的权利，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不难想像。古老枯燥的题目，味同嚼蜡的推理，有时间有礼貌有耐心而不退场的听众往往靠惯性撑到最后迫不得已鼓掌几下了事。但小说里的讲座就大不一样了。小说人物来迟了，讲座的前半截可以省略。演讲者科斯特洛一跑题，她那充满敌意的博士媳妇就不干了，立马开口提醒。演讲后，晚宴餐桌上的勾心斗角，更让读者感受到讲座所遗留的弥漫在头顶的硝烟。台前台后的这种种氛围，纯粹的学术讲座是无法涵盖的，小说则别擅胜场。

讨论动物维权，不用论文形式而用小说方式，库切大概别有深意。因为论文的语言多半是理性的语言，抽象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正是人类用来剥夺动物权利的语言。哲学家，如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莫不沿着一条思路往下走：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人类具有神性，动物具有物性”。这是人类任意屠宰动物的基本原理。可是，小说家科斯特洛认为，理性不过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倾向，怎么可以为了人的一己之私把它置于宇宙的中心来衡量一切呢？怎么可以用这个所谓的“理”来杀戮百万动物的“命”？

要理，不要命，人类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人类中了理性的毒。解毒药在哪里？

目 录

引言	艾米·古特曼 1
动物的生命	J. M. 库切 13
哲学家与动物	13
诗人与动物	57
解读《动物的生命》	92
玛乔里·加伯	92
彼得·辛格	110
温迪·唐尼格尔	120
芭芭拉·斯马茨	138
译后记	159

引言

艾米·古特曼

艾米·古特曼：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劳伦斯·S. 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动物的生命》就是《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之一）的创办主任。她著有《民主教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民主和争议》（与丹尼斯·汤普森合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和《肤色意识》（与安东尼·阿皮阿合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约翰·库切在《冒犯：漫谈审查》中写道：“对于某一类艺术家来说，所谓严肃是绝对要跟符合审美和符合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在约翰·库切为普林斯顿大学 1997—98 年度特纳系列讲座写的讲稿——《动物的生命》中，他展示了某种能与审美和道德结合起来的严肃。就像典型的特纳系列讲稿，库切聚焦于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但库切的讲稿所采用的形式又与典型的特纳系列讲稿大相径庭。典型的特纳系列讲稿一般采用哲学论文的形式。库切的讲稿采用小说的形式：两次讲座里套着两次讲座；后者对动物权利这个主题进行了更典型的哲



学探讨。库切促使我们去想像一个像特纳讲座那样令人为难的学术场合，虚构的人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和库切一样，也是一位小说家）应邀到阿波尔顿学院发表两次演讲。校方以此表示对小说家的敬意，演讲的题目也由小说家自己选择。令主人感到吃惊的是，科斯特洛没有就显而易见是其专业的文学或文学评论发表演讲。她却利用这个机会来详细讨论她所谓的“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罪行”。包括她的学术同行在内的人类同胞都习惯性地、心满意足地犯了罪：虐待动物。

库切将年迈的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与其亲戚和文学同行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戏剧化了。她激进地视其他人为罪犯，而其他人士则认为她无权对他们提出以下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在对待动物方面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他们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愿望这样做。在小说的框架里，库切有关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访问阿波尔顿学院的故事包含经验范畴的和哲学观点的论争，这种论争与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的道德观有关。不像有的动物，人类不是一定要吃肉。只要我们去尝试，我们就能够以对它们的“生存感觉”应有的同情心来对待它们。在科斯特洛的第一次讲演（也是库切第一份讲稿的主要部分）中，她断定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所显示的缺乏同情心是没有借口可言的，因为“并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人类设身处地地

为另一种生物着想，怀有同情的想像是没有界限的”。但绝大多数人在有关动物的问题上并不发挥这样的想像力，因为我们“（在动物问题上）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方面无所用心”。

科斯特洛断言，我们已与动物停止了情感交流，我们的理性思考也顺从了我们的情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同情心）。她争辩道：哲学在起引导作用方面相对软弱，或者它无论如何也指不出正确的方向，因为它滞后于我们的同情心。这就把担子压在了我们的理性机制以外的别的什么东西上面。而哲学一向求助的就是我们的理性机制。她争辩道：我们具有同情心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更多的是诗歌和小说，而非哲学所需求的），应延伸到人以外的别的动物身上。因此在库切的笔下，小说的形式似乎具有一种道德的目的：让我们的同情心延伸到动物身上。要是小说都无法这样延伸我们的同情心，那么哲学也做不到。要是小说做到了，那么哲学也许将跟着做到。

所以在库切的讲稿中，科斯特洛的讲演请求听众“敞开心扉倾听内心的声音”。动物们拥有权利吗？人类可以对它们是否拥有权利如此地不管不顾吗？动物拥有何种灵魂？我们拥有何种灵魂？科斯特洛在她的讲演中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于她急于要做的事情显得哲学味道太浓了。上述哲学思考假定心灵能引导性情。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有年复一年劝

说人们接受她的动物观的经历，这种经历促使她否定了这种假定。科斯特洛只得对阿波尔顿学院的听众说：“假如你们想要有人来这里为你们区分终有一死的灵魂与不朽的灵魂，或者区分权利和责任，你们更应该去请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唯一能引起你们注意的就是写写虚构人物的故事的人。”

库切通过让我们面对一个年事已高、表达力出众、悟性很强、越来越与他人疏远的小说家来激发我们的想像力。她不能不对她的人类同胞感到气恼。这些人类同胞中有不少是学者，他们不必去虐待动物，但显然（他们并不承认）也干下了残忍的事情。这个故事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把理性看做是普遍价值的信念。世界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吗？上帝是理性之神吗？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人接近于神，动物接近于物”。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强烈地反对人类中心说的观点：“理性既不是宇宙的存在，也不是上帝的存在。正相反，在我看来理性作为人类思想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比这还要糟糕，理性似乎只是人类思想的某种倾向。”

科斯特洛是不是反对得太多了？虽然科斯特洛争辩说，哲学在形成我们对动物的道德观方面完全地无能为力，但她却也有意识地在讲演中运用了哲学。她经常要驳斥那些认为生物没有理性其生命就缺乏价值的观点，证明那些观点站不住脚。她问道：“我们所认

定的意识形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竟使得杀死一个拥有意识的人就是犯罪，而杀死一头动物却免受惩罚。”与哲学家不同，诗人以对动物的经验的“一种感受”为起点。这种感受引导他们承认杀死任何动物都是犯罪，因为任何动物都能体验活在世上的生存的情感。科斯特洛敦促我们承认这种对动物完整的生存的同情心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她这样发问：“要是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死亡，那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真切地思考蝙蝠的生活？”

如果不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那么设身处地去思考动物的生命的用意又何在呢？不过照科斯特洛本人的说法，她的动机更是“一种拯救自己灵魂的愿望”而非道德上的定罪。尽管她对待批评她的人就如同他们在精神上迷失了方向，但她并非自以为是到了以为她已经成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的地步。阿波尔顿学院的院长显然是为了缓解正在升级的紧张气氛，说他很尊重她的生活方式。但她拒绝接受这样的恭维。科斯特洛对此作出回应，指出她还穿着皮制的鞋，挎着皮制的包。院长为她辩护说：“我们当然是能够在吃肉和穿皮货之间看出区别的。”但科斯特洛却毫不妥协地回答说：“只是可憎的程度不同罢了。”院长的努力反倒助长了紧张气氛。科斯特洛拒绝接受任何恭维。尽管她的情感 and 行为也许超越了她的人类同胞，但它们却依然是其内在痛苦的根源。

科斯特洛自己是意识到的。她抢在最敌对的批评者冒出来之前，赶紧说她知道“这种谈论会使人们的意见两极分化，遭人反感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她提到的这种谈论是一个她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类比：她将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与第三帝国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加以类比。“通过像对待野兽那样地对待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类同胞，”她谈到纳粹时说，“他们也因此使自己变成了野兽。”她继续说：“在我们周围进行的是一种堕落、残忍和杀戮的行当，它可以与第三帝国做得出的任何行为相比……”

拿大屠杀作比不可能不引起他人的异议。事实上，科斯特洛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哲学家，而是来自从理论上讲是科斯特洛的同道——一位年迈的诗人亚伯拉罕·斯特恩。斯特恩拒绝出席为科斯特洛举办的晚宴，并非出于对她的不尊敬，而是因为她的第一次讲演深深伤害了他。斯特恩送来一封信，告诉科斯特洛不能与她一同进餐的原因：

为了你自己的目的，你接过了常有人提起的一个类比：遭杀害的欧洲犹太人与被屠宰的牲口之间的类比。你说，犹太人死得像牲口，因而牲口死得像犹太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文字游戏。你误解了类比的性质；我甚至认为你是故意误解的，简直到了衰渎的地步。人被造得与上帝相

像，但上帝并不与人相像。可以说犹太人受到牲口那样的对待，但并不能接着就说牲口受到犹太人那样的对待。反向的说法侮辱了对死者的纪念。同时也太轻巧地利用了集中营的恐怖。

就像斯特恩被科斯特洛的道德情感伤害过重而不能亲口对她说出，科斯特洛也因为同样原因而不去回应斯特恩的批评。两个人都因对方的情感而受到伤害，而且他们在有生之年也没有愿望、能力或时间去弥合他们之间道德和审美的分歧。

《动物的生命》使读者清楚无误地认识到：要使道德方面严肃认真的人们同情甚至理解彼此的观点有多么困难。小说中两位年迈的作家——科斯特洛和斯特恩之间的隔阂之深，并非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太较真产生的后果。事情不那么简单。当小说结尾时，也是科斯特洛结束其对阿波尔顿学院的访问时，她再度援引大屠杀的类比。在对儿子说到她感到这个世界是如何彻底地迷失方向时，她想像自己走进朋友家的卫生间，看到一块肥皂的包装上写着“特雷布林卡^①出产——100% 人体硬脂酸脂”。她这样去想像吃肉的人

① 特雷布林卡：纳粹德国主要的集中营、灭绝营，在波兰华沙东北 100 公里靠铁路的村庄特雷布林卡附近。《动物的生命》里的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多次提到这个地方。

类同胞，也想像自己同时看到了这些人眼睛里流露的人类善良的天性。“生活就是这样。所有其他的人都对生活屈服了，”科斯特洛提醒自己说，“为何你就不能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呢？”

是否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应该向她的家人和朋友对待动物的方式屈服呢？还是她应该去转化他们？她应该转化我们中那些与她出发点不同的人，使他们站到她的立场上？库切没有给我们答案。这个故事在虐待动物问题上，以及显然与之相关并用于类比的人类犯下凶残罪行的问题上，留给读者的是存在于道德方面严肃认真的人们之中的鲜明的冲突感。库切留给我们的问题的核心是：是否存在某种方式（不管是哲学的、诗学的，还是心理学的），能够消除这些道德上的冲突或调和这些对立的情绪。

四位知名人士对库切讲稿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探讨。他们是文学理论家玛乔里·加伯、哲学家彼得·辛格、研究宗教的学者温迪·唐尼格尔和灵长目学家芭芭拉·斯马茨。就像已经出版的几册《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动物的生命》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之一），《动物的生命》吸收了彼此很少关联的不同学科的观点。加伯、辛格、唐尼格尔和斯马茨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甚至都算不上相关学科的学者，但把他们的评论综合到一起，有助于对人类能够如何和应该如何与

动物交往的问题，形成更加完整的认识。

玛乔里·加伯在将《动物的生命》与“学院小说”进行比较的同时，着重于分析它的特色。《动物的生命》充满了同情心，而不像典型学院小说那样充满喜剧性。两者的相似性在于提出我们时代“某些最迫切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加伯探讨了小说和文学评论中借助能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的类比（诸如“被谋杀的欧洲犹太人与被屠宰的牲口”）的表现方式。她指出：虽然大屠杀这个类比是否适当会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它却是人们经常运用的，有时候是不那么直截了当的，有时候则不然，比如很受喜爱的（争议也较少的）儿童影片《小猪进城》（*Babe*, 1995）。加伯考察了文学以外的领域运用类比的长处和短处。小说远比哲学更讲究“语言的艺术”，这种艺术经这方面的专家库切之手，能激发我们去探寻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激活他们想像力的道德问题。因此就像加伯所提出的，《动物的生命》关注文学价值的程度不下于关注动物的生命的程度。

对库切作品的另一篇评论是以虚构的对话形式写下的。两个对话者是关注动物权利的哲学家和他的女儿。彼得·辛格作为哲学界最著名的动物权利的维护者，想像自己处于要与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当面对质的尴尬境地。后者在动物问题上的见解甚至比他更难以常人所接受。哲学家对他的女儿说：“她的讲演